

6252/3757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0096

学术讨论会



曲折的道路 艰辛的历程

——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探索

罗学工

广西柳州铁路局党委宣传部

1991年7月

曲折的道路 艰辛的历程

——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探索

广西柳州铁路局党委宣传部 罗学工

内 容 提 要

本文通过对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历程的回顾,论证经过艰辛探索总结出来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全文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五个阶段——一条曲折前进的轨迹”回顾党在不同时期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成绩与失误,勾画出一条曲折前进的轨迹。说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经济的“六字方针”就是40年探索的结晶。

第二部分:“三次调整——三座艰辛探索的丰碑”对国民经济三次重大调整的相同点和差异处进行比较,论证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是一个呈波浪式不断前进,逐步深化的过程,“六字方针”就是对这个过程科学总结。

第三部分:“六字方针——两点重要而深刻的意义”阐述“六字方针”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着重论述“六字方针”对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的现实指导意义,说明贯彻这一方针是使我国的经济建设沿着健康方向前进的重要保证。

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是党在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我国四十一年经济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后形成的重要共识，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规律的认识日臻成熟。

从开始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指导方针提出，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纪念建党70周年的时候，回顾这段曲折而艰辛的探索历程，对于深化理解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提高贯彻执行这一指导方针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五个阶段——一条曲折前进的轨迹

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探索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探索的起步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指导思想：

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提出了“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

1952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此同时，党中央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指导方针：1956年5月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同年9月，党的八大进一步提出要“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的指导思想。

在以上这些路线、方针、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辉煌的成就，仅用三年时间就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顺利地制定和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使二农业生产总值连续五年以13.5%的速度持续、稳定地发展。实践证明，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在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探索中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第二阶段：从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探索出现了曲折和失误，主要表现是：

对“反冒进”的批判使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偏向的主张受到压制；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这些指导思想的出现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轻率发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重大挫折。

第三阶段：从1960年到1966年，是党对错误和挫折进行总结、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进行调整和新的探索的时期。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随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分析认识国情的基础上，对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1961年6月，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搞几年慢腾腾。”他还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就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以及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期间，党中央还陆续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以及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等一系列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

1964年12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号召全国人民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提出分两步走的设想：在1990年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制；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这些号召和设想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宏图大志，又充满了从国情出发的求实精神，是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探索中的宝贵成果。可惜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些号召和设想没有得以实施。

第四阶段：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党对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探索在徘徊中前进的时期。

文革时期，由于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斗争上，党对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探索相对放松，没有就经济建设提出新的重大见解。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在继续探索的道路上既有成绩，又有失误。1977年党的十一大重申了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指导思想没有根本纠正，在经济建设中重蹈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复辙，大搞脱离国情的高指标、洋跃进。导致国民经济重大的比例关系再次严重失调，经济建设出现新的困难。

第五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是在正确路线指引下，不断地纠正错误，对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认识日臻成熟的阶段。

这个阶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到本世纪末，使人均国民收入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再花三十至五十年，使我国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构想。他反复强调，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经过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他指出，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

陈云同志提出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的思想，他反复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经济

在不再折腾的前提下有较快的发展，他号召全党“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陈云同志还提出了按比例就是最快的速度的思想，发展经济必须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方针的思想，发展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思想。

李先念同志提出经济建设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要注重经济效益的思想。他指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循序前进的连续过程。国家实力的增强，需要长期的积累。他尖锐地指出，不讲求经济效益的“高速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无效劳动。

这些认识和思想的提出，推动了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探索的深化。

1979年，党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扭转了当时国民经济虚假繁荣和盲目发展的状况，使国民经济重大比例逐步趋向协调。

1985年，党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七五计划的建议中，强调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使积累和消费保持适当的比例，以及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等指导原则。

1987年，党的十三大作出我国现在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提出了分三步实现现代化的战略。

198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针对当时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经过二年多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989年，十三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无论是治理整顿期间还是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都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不久前召开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是我国四十一年经济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反映，全党同志要时刻牢记。

这些指导思想提出及实践结果表明，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已经形成，这是党40多年艰辛探索的成果，是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贡献，是党的宝贵财富。

二、三次调整——三个艰辛探索的丰碑

包括现在正在深入进行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党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40多年的历史中，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三次重大的调整。每次调整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对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探索的深化。三次调整，犹如三个丰碑，连接着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漫长而曲折的探索历程。

三次调整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处，比较它们的同异，可以看到，在三次调整之间，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首先，从三次调整相同点的比较，可以看到，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探索是一贯的。三次调整都是在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进行的，党为调整制定了正确的方针，都取得了使比例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回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上来的辉煌成果。

第一次调整是1961年开始的。由于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日益严重，导致连续三年的“大跃进”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消费品急剧减少，财政收支不平衡，人民生活极度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经过三年的努力，扭转了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工农业生产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农轻重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平衡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经济效益显著提高，财政收支趋于平衡，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二次调整从1979年开始。文革十年动乱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左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工作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因而提出了“大干快上”、“新的跃进”等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过高、难以实现的设想和规划。不顾国情、国力的实际，盲目引进，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再次严重失调，积累与消费，轻工业与重工业，能源、交通与加工业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病日益严重，经济效益日趋低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左倾思想错误并指出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为国民经济调整奠定了思想基础。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且提出了又一个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经过几年调整促使国民经济重大比例恢复了正常，工农业生产持续、均衡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度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调整取得的这些成果促进了六五计划的完成，并且为七五计划以至整个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从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是在经济生活出现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就出现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等现象，在改革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忽视了必要的和适当的集中，在强调微观搞活时，忽视了综合平衡和宏观调控，由于对这一系列问题未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以致问题越积越多，最终导致社会总需求远远超过总供给，工农业比例关系，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资金、外汇、物资的分配过度分散，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严重削弱和高消耗、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费、低效率等现象。针对这些现象，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措施。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治理整顿取得显著效果，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降了下来，农业获得较好的收成，固定资产投资有所控制，物价上涨势头趋于缓和，货币回笼情况较好。治理整顿的这些成果为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顺利实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其次，通过三次调整差异处的比较，可以看到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探索是不断前进，逐步深化的。

1、在指导思想上

第一次调整期间，党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了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从而保证调整顺利进行。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调整一开始，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说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问题只是在于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①这就是说，需要调整的只是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而不是左的指导思想。这种具体政策的调整和左倾指导思想的矛盾，在调整深入发展以后就逐渐暴露了。1962年2月的“西楼会议”和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当时的经济困难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提出了“要退够，争取快，准备慢”的调整指导思想。由于触动了经济建设中的左倾思想，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两次会议的正确认识被指责为“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上，左倾错误发展得更加严重，幸而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人的意见，不因搞阶段斗争影响当前的工作，才保证了调

整的顺利进展。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没有纠正使得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现象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得以反复出现。

第二次调整和现在正深入进行的治理整顿是在党全面拨乱反正，纠正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的基础上进行的。经过调整 and 治理整顿的实践，党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上，从片面追求工业产值的增长转向注意农轻重协调发展；在发展速度上，从片面追求高速度、高积累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根据国情国力的实际适度发展；在经济体制上，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模式，转向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的，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从封闭半封闭开始转向积极利用国际市场的开放型经济。特别是在这次治理整顿中，党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治理整顿期间也好，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也好，都必须深刻记取急于求成大起大落的教训，任何时候都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坚决防止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坚决不搞脱离实际的“大于快上”。这些富有意义的转变表明在第二次调整和治理整顿期间，党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2、在对国情的认识上

对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是导致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就是对国情再认识的过程。从第一次调整到现在正在深入进行的治理整顿，党对国情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提出调整任务的同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之风，毛泽东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年，实事求是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了一个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热潮，在对当时的国情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基础上，中央降低了经济建设指标，调整了政策，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实行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下放，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等。然而，当时对国情的认识还是初步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认识的必然王国”。^②

在第二次调整中，党对我国的国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以此为指导认识中国的国情，逐步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正在进行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更是全党深刻分析认识国情的过程，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绩、困难和问题进行了清醒的分析，从而提出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

最近召开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则对处在经济发展战略第二步的起跑线上这一关键时刻的基本国情作了精辟的分析，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第二步的基本要求，建设重点和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指导方针。

总之，从第一次调整到正在进行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党对国情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知之不多到比较全面了解，由盲目到比较自觉的过程，这是党能够制定正确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最重要的原因。

3、在调整的具体措施上

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三次调整的具体措施不尽相同。第二次调整和正在进行的治理整顿以改革贯穿于始终，边调整，边改革，以改革促进调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点，党在实践中认识到，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促使经济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客观要求，因此，无论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调整还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治理整顿，都把深化改革当作重要的方针，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广泛展开了改革。而第一次调整时，改革尚未成为党的自觉要求和行动，虽然也在某些领域进行了改革，但是无论广度和深度都比不上后两次调整，而且开始不久就被“文革”中断了。

越来越重视运用经济手段，是三次调整在具体措施上的又一点差异。第一次调整，更多地是使用行政手段，关停并转，压缩基建规划，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而后两次调整，党逐步把注意力放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建立经济调节机制上来，比如这次治理整顿，党中央国务院就通过采取财政信贷双紧、开征投资方向调节税、实行差别税率等经济手段，逐步达到了紧缩社会总需求和调整投资结构等目的。

在三次调整中，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认识是呈螺旋状不断上升的，三次调整将以其为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作出了宝贵探索的功绩，载入党的史册。

三、六字方针——两点重要而深刻的意义

经过40年的艰辛探索之后，党提出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六字方针”，这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对于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促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深刻的理论意义

“六字方针”既是对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

持续发展是指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及各种比例关系在国力允许的条件下，使经济发展有一个较长时期的时效，以求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进步。这既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即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又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所以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就在于这种制度能够促进生产力以比在别的社会制度条件下更快的速度发展。我国现在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标志就是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要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上最终超过资本主义，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以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速度持续发展。

稳定发展是指国民经济在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力求缓和波动，减少周期幅度，避免造成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在实际运行中，经济发展却不可能是一条直线而只能是一条波动前进的曲线。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努力减少波动的频率和幅度，降低经济增长的不稳定系数，抑制上波期的经济过热，缓解下波期的经济衰退，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

协调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各产业部门之间适当的增长速度和合理的比例关系。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与消费、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能源交通工业与

加工工业等，都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保持重大比例关系的基本平衡，这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前提。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事物的平衡是相对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处在动态中的变量，保持它们之间的平衡更非易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探索保持相对平衡的途径，合理确定和安排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保持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各自的和相互间的平衡，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六字方针”是一个整体。“持续、稳定、协调”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六字方针”的提出，是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它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领导已经走向成熟。

2、重要的实践意义。

“六字方针”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尤其是对完成“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各项任务，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所以是一个扎实而又鼓舞人心的行动纲领，就是因为它全面、准确地贯彻了“持续、稳定、协调”的“六字方针”。

在今后的经济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战略目标的实践中，“六字方针”将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六字方针”的贯彻，将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彻底走出过热——调整——再过热——再调整的怪圈。建国以来，国民经济的几次重大调整都是由于经济过热引起的。过热现象的反复出现，严重地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党对经济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不是完全没有认识，特别是在经济建设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认识还是清醒的。如“大跃进”失误后，毛泽东意识到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50年不行，至少要100年；60年代中期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十二大提出的分两步走的经济建设发展战略，都体现了这一点。问题在于一旦我们的日子好过一点的时候，就头脑发热，就要搞“大干快上”，就要实行“经济跃进”，而每一次“跃进”的结果又使经济陷入衰退的困境之中。

导致这种恶性循环的深层原因有二：一是国情的原因。我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基上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小农经济根深蒂固，加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经济差距，很容易使在政治、经济上获得了解放的人民产生一种急于摆脱贫穷落后，早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情绪。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领导者，我们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和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而很容易受到急于求成情绪的影响，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常常头脑发热，提出过高的经济发展目标和要求。“大跃进”期间，“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目标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就是在这样的情绪推动下提出来的。

二是对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仍较多地停留在感性阶段，只是当受到客观规律惩罚，经济建设出现困难和挫折时，才感觉经济规律的重要。因而尊重它、遵循它，依靠它来调整经济使之恢复正常运转。一旦经济好转，急于求成的情绪又驱使我们企图逾越经济规律去创造“经济跃进”的奇迹。这里深层原因还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缺乏理性的认识。

现在，经过治理整顿，我们又一次把过热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了下来。问题是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在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能不能有效地防止出现新的过热，能不能避免新的反复。“持续、稳定、协调”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使我们得到肯定的回

答。因为“六字方针”强调保持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强调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追求实质性的社会进步而不是虚假的经济繁荣，追求持续稳定的发展而不是大起大落。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六字方针”，我们一定能够走出一条良性循环，发展经济的路子来。

第二，“六字方针”的贯彻，将使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经济建设必须保持一个适当的发展速度，过高或过低的速度都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六字方针强调协调发展，就是要把经济发展速度建立在与国力相适应的基础上，这是我们确定最佳发展速度最重要的依据。最近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我国今后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左右的速度就是根据“六字方针”确定的，这个速度比前十年平均每年增长9%的速度要低，所以看起来不是那么激动人心，但实际这却是最高的速度。首先，它大大高于世界经济3%的平均增长速度；其次，这个速度是建立在与国力相适应的基础之上的。经过40多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增长了1.36倍，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根据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以现有的国力，我们完全可以承受6%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避免折腾和反复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只要按照这个速度持续稳定地发展，我们就能够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目标，就能够使人民过上小康水平的生活。

第三，“六字方针”的贯彻，将促使我们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通过外延扩大再生产的途径来发展经济，即主要是依靠增加投入，增加设备，扩大基建等手段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这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同时也带来一些弊病，主要是片面追求高速度、高产值，忽视质量、效益，造成人、财、物力的大量浪费。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这些弊病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顽症，严重地制约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高度重视的地步了。把发展经济的注意力转移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路子上来，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这既是“六字方针”包含的内容，又是贯彻这一方针的客观要求，持续稳定地发展，必须建立在科学进步和加强管理的基础上，而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更是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务院决定，1991年为“质量、品种、效益年”，随着这一活动的深入开展和“六字方针”的深入贯彻，我国的经济建设将出现从以速度产值为中心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转变，这将是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一次最有意义的转变。

党经过40年的艰辛探索，确立了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经济的方针，这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沿着健康的方向前进的根本方针。遵循这一方针，我们要努力创造一个总量平衡、主要比例关系协调的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使国民经济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注释：

①②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